

# 近代中日學術交流考論

——以胡適與青木正兒為中心<sup>\*\*</sup>

徐 雁 平<sup>\*</sup>

## 摘 要

日本中國學的形成和中國現代學術的建立有非常相似的歷程，本文首先探討日本傳統的中國研究是如何轉變成有近代意義的中國學，認為清代的考據之學和歐洲的東方學在這一轉變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而正是在相似的學術背景之下，中日之間的學術交流變得更有可能、更有成效。其次以胡適和青木正兒的交往來展開論述，闡明日本的中國小說戲曲珍稀文獻的發現，以及先行一步的研究對中國學者的啟迪與幫助，其中胡適的《水滸傳》考證最能說明問題；最後著重考察中日學術交流中的互動，通過胡適和青木正兒這一途徑，日本的中國學家的成績如內藤湖南關於章學誠的研究、那珂通世關於崔述的研究等等，傳入中國並促進了整理國故的發展，而胡適倡導的整理國故也由「媒介人物」青木正兒及《支那學》介紹進入日本，青木正兒的部分學術研究也曾受到胡適的影響。經過以胡適和青木正兒為中心的考論，本文試圖證示二十世紀初期的中日學術交流對中國學研究的推動之功。

關鍵詞：中國學術史、近代中國、胡適、青木正兒、整理國故

---

\* 作者係南京大學中文系講師。

\*\* 本文初稿曾得到南京大學中文系徐有富教授、張伯偉教授的指點；又據兩位評審先生所提意見作進一步修訂，在此深表謝意。

## 一、前言

賀昌群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曾將日本的中國學分為四個時期，即明治初年至 23 年（1868-1890）為第一期，明治 23 年至 30 年（1891-1897）為第二期，明治 30 年至大正 3、4 年（1898-1915）為第三期，大正 3、4 年之後（1915- ）為第四期，<sup>1</sup>本文以第二、三期作為背景，以胡適與青木正兒的交往為個案，探討第四期內的中日學術（偏重於文學史研究）交流。日本學者研究中國，至近代有明顯的轉變，那就是從原來的學習模仿，到抽身而出，把中國看作是客觀的研究物件；同時，對於中國而言，日本也從學術的輸入國變為學術的輸出國。而在中國文化作為一種研究物件時，情形也比較複雜，熟諳日本文化的周作人把日本的中國學分為兩大類，「其一是為學術的，雖然在思想方法上稍有新舊之分，但是目的在於求知則是一樣；其二可以說是為實用的，而其實用又是拓殖的準備，所調查研究者大率以經濟風俗社會制度為多，其成績當然也不壞，可是居心卻不可問了」。<sup>2</sup>依此標準區分，本文討論的內容是屬於「為學術」的一類。

## 二、近代日本學術的轉變與近代中國學的形成

京都學派的核心人物內藤湖南（1866-1934）在 1921 年的一次名為「何謂日本文化」的演講中指出，日本要建立世界最完美的文化，就必須要充分認識自己過去所有文化的價值。

日本文化是東洋文化、中國文化的延長，是和中國古代文化一脈相承的，所以，要想知道日本文化的根源，就必須先瞭解中國文化。今天講歷史只講日本的歷史，而不瞭解以前中國的事情，那麼，對於日本文化的由來就什麼都不知道了。<sup>3</sup>

1 賀昌群，日本學術界之「支那學研究」，《圖書季刊》，1：1（1934.3），頁 12。

2 周作人，日本期刊三十八種中東方學論文篇目附引得序（1933.9.10），于式玉編，《引得特刊之六》（北平：哈佛燕京學社引得編纂處，1933），頁 1-2。

3 內藤湖南著，儲元熹、卞鐵堅譯，《日本文化史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頁 12-13。

內藤湖南在此雖然強調了研究中國文化的重要性，但其語意中明顯是偏向「中國古代文化」、「以前中國的事情」，而避開與鴉片戰爭以及甲午戰爭以後衰弱的中國的聯繫。事實上，內藤湖南以前的中國文化研究，即傳統的漢學，是以中國古典為中心，特別是強調以儒家的觀點方法來理解日本社會，雖然日本對儒家經典的學習研究沒有中國獨有的皓首窮經的迷狂狀況，但一種普遍崇敬的心態還是存在的。同時領導階層對於子書也多加留意，「如幕府財政革新之重點，幕府內部秩序之建立，則頗採子書之思想。如《韓非子》、《孫子》、《管子》、《鹽鐵論》等非中國所謂主流之子書」。<sup>4</sup>大致而言，此時的漢學還沈浸在對中國文化的溫情與敬意之中，但在明治維新（1868年以後）的「文明開化」的價值取向之下，這種「一元論中國觀」被打碎了。

造成「一元論中國觀」破裂的外在力量是歐美近代思想文化的湧入，「先是英國的功利主義，再之以法國的自由民權學說，繼之以美國的人道主義與實用精神，直至德國的國家主義，前呼後擁地進入日本社會」。<sup>5</sup>這種境況必然動搖中國文化的權威地位，倡導文化創新說的中江兆民（1847-1901）認為「中國的詩文，到了宋朝以後，不值一讀。生在古人以後，就要在古人開拓的田地以外，另行播種，另行收穫」，曾較早赴歐美學習考察的福澤諭吉（1834-1901）在1885年發表極端的《脫亞論》，認為支那、朝鮮「不知改進之道，其戀古風舊俗，千百年無異。在此文明日進之活舞臺上，論教育則云儒教主義；論教旨則曰仁義禮智，由一至於十，僅以虛偽為其事。其於實際，則不惟無視真理原則，雖極不廉恥，傲然而不自省」。<sup>6</sup>在西化的過程中，雖然有不少學者執著于以儒家為中心的中國文化，欲挽狂瀾於既倒，如安井息軒（1799-1876）著《辨妄》全力展開對基督教的批判，西村茂樹於1876年創辦修身學舍（後改名曰本弘道會），三島毅1877年創辦二松學舍，「以維持與擴張東洋固有的道德文學」，<sup>7</sup>但這類復興儒學的努力都不能

4 町田三郎著，連清吉譯，《日本幕末以來之漢學家及其著述》（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頁188。

5 嚴紹盪，《日本中國學史：19世紀60年代——20世紀40年代中期》（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頁148。以下論述有多處參考此書，特此說明。

6 嚴紹盪，《日本中國學史》，頁158-162。

7 以「發明國學保存國粹為宗旨」的國粹學派對此思潮也頗為關注，並引以自勵，黃節在《國粹學報敘中》說：「日本維新，歸藩覆幕，舉國風靡於時，歐化主義浩浩滔天，三宅雄次

挽回傳統漢學的沒落，中國文化在西方文化的背景下，變為客觀的研究物件。西田幾多郎（1870-1945）《善之研究》是日本哲學思想史上第一部擺脫中國傳統儒學影響、追求世界性價值的哲學著作，它的問世，標誌日本傳統漢學的終結。

日本近代中國學有兩個來源，一是清代的考據之學，一是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後興起的「東方學」。兩個來源之間的內在關聯，中山久四郎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一篇文章中曾論及：

〔清朝〕考證學風及《說文》學風，與近世日本學術一變之大影響，最可注意。又由此之學術研究而養成精博細密又明證徵實之頭腦，思及明治維新後，西洋學術之博受與研究，亦供給間接利益之副產利益以遺後世，則清朝學風與近世日本之影響頗大。<sup>8</sup>

日本漢學中的考證學派的先驅是新井白石（1657-1725），他的著作有《讀史餘論》、《同文通考》、《古史通》，在他之後的名家有片山兼山、井上金峨（著有《經義折衷》、《匡正錄》、《辨偽考》等）、岩洵龍溪、太田錦城（著有《論語大疏》、《九經談》等）、狩穀掖齋（著有《說文緯》、《轉注考》、《經籍訪古志》等）等，「文政、天保（1818-1844）以後，以經書研究作為專業的人次第凋落。松崎慊堂（1771-1844）從洛閩之學（宋學）出發，而歸著到漢學（考證學）、豬飼敬所（1761-1845）則導源古學而以博著稱。朝川善庵（1781-1849）、東條一堂（1778-1857）等人則愛好旁徵博引，總之這些都是考證之學」。<sup>9</sup>但這種考證學還局限在經學範圍裏，內藤湖南試圖突破這種偏狹的學風，他認為應將如「歐西近時學士」的顧炎武、戴震、錢大昕等的實事求是精神發揚光大，「故亦宜提升日本現階段清朝考證學之學術水平，確立研究方法，鞏固東洋學術之基礎，進而拓展世界文明之新里程」。<sup>10</sup>

郎、志賀重昂等撰雜誌，倡國粹保全，而日本主義卒以成立。」見《國粹學報》第一年乙巳第一號（光緒三十一年正月二十日）。中日國粹派之間的關聯，可參閱鄭師渠，《晚清國粹派》（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第2章第4節「中日國粹派出現的歷史機緣之異同」，頁50-54。

8 中山久四郎著，連清吉譯，「清朝考證學風與近世日本」，《中國文哲研究通訊》，10：2（2000.6），頁17。日本中國學的發展史，可見莫東寅，《漢學發達史》（北平：文化出版社，1949），第7章「鴉片戰爭後漢學之發達」中第10節，頁155-167。

9 內藤湖南，「儒學」，《日本文化史研究》，頁254。

10 町田三郎著，連清吉譯，《日本幕末以來之漢學家及其著述》，頁201。

對清代考證學的看重，直到二三十年代還沒有改變。吉川幸次郎（1904-1980）回憶他 1928 年至 1931 年在北京大學期間的學習生活時說：「那時我的興趣在清代考據學，所以，以此為重點購書。」<sup>11</sup> 如何提升清代之考證學呢？這就得借助歐洲的東方學的力量了。這也是近代中國學的另一個來源。日本近代中國學創始人大都有留學歐洲的經歷，如井上哲次郎（1855-1944）1883 至 1890 年在德國學習，白鳥庫吉（1865-1942）1901 至 1903 年在德國等國學習，內藤湖南 1924 年至 1925 年赴歐美訪問，服部宇之吉（1867-1939）在 1900 年後在歐美留學數年，狩野直喜（1868-1947）1912 至 1913 年赴歐洲留學，這種學習交流，最終將歐洲的中國學導入日本，使近代日本中國學與它同屬一體系。<sup>12</sup> 白鳥庫吉已脫離傳統漢學的樊籬，以世界學術為目標，專注於中國周邊國家的研究；狩野直喜之孫狩野直禎指出歐洲東方學對狩野直喜的學術影響有兩個方面：

第一、歐洲學者之研究方法的瞭解，使他再次認識到了清朝考據方法是學術研究的正道，即兩者都把文獻批判作為必須的階段。第二，開始積極關心近世的戲劇、小說，研究以道教為代表的民間風俗習慣，主張在中國哲學研究上運用民俗學的方法。<sup>13</sup>

以考據為內核的近代日本中國學的迅速興起，還與甲骨文獻及敦煌文物這兩項重大的發現有關，這讓日本新起的學者堅信在細密的文獻考訂之外，還得靠文獻與文物結合參照的新路徑來擴大中國學的範圍，更新研究方法。這一時期，圍繞兩大發現的中日學術交流，如羅振玉對林泰輔（1854-1922）甲骨文研究的推賞，以及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對內藤湖南的啟示，<sup>14</sup> 而論到敦煌文物的研究，那就必須提到作為日本近代中國學重要組成部分的敦煌

11 吉川幸次郎著，錢婉約譯，《我的留學記》（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9），頁 65。

12 嚴紹盪，《日本中國學史》，頁 193。1887 年至 1902 年，德國蘭克學派的主要學者里斯（Ludwig Riess, 1861-1928）在東京帝國大學史學科執教，傳入蘭克學派的客觀史學理論和研究方法，催發了日本中國學中近代形態的中國史研究，里斯的同事坪井九馬三（1858-1936）和學生白鳥庫吉在此領域影響頗大。

13 坂出祥伸，日本之中國哲學研究學科的確立：京都大學的情況，《清華漢學研究》（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0），第 3 輯，頁 81。此文將狩野直喜留學歐洲時間定為 1911 年至 1912 年，然據狩野直禎編《狩野直喜博士年譜》（見《東方學》1971 年 8 月，第 24 輯，頁 28）以及袁英光、劉寶生編《王國維年譜長編》所釋《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歐洲》寫作年月，可以斷定坂出祥伸有誤。《日本中國學史》在頁 279 處，亦有誤。

14 這種學術交流可參見嚴紹盪，《日本中國學史》，頁 253-268。

俗文學的研究，其中值得特別一提的是狩野直喜，他說：「近年來，在中國，在日本，起了研究俗文學的氣運；同時，歷來埋沒著的世間所不知道的鈔本和刊本，關於這方面的文學的書籍，偶然出現了，這對於學者底研究上，給與不少的裨益。」<sup>15</sup>

1910年8月，京都帝國大學派遣內藤湖南、狩野直喜、小川琢治（1870-1941）三教授與富岡謙藏、濱田耕作（1881-1938）二講師，赴北京調查保存在學部的敦煌文物；1912年狩野直喜又赴英法考察兩國所收藏的敦煌文物，他的研究結果，於1916年以「中國俗文學史研究底材料」刊於《藝文》雜誌（第7卷第1號、第3號），1913年他在回國途中，又在聖彼得堡發現中國戲曲史上的珍寶《劉知遠諸宮調》，並將其公諸於眾，1920年王國維在《東方雜誌》第17卷9期上發表題為「敦煌發見唐朝之通俗詩及通俗小說」一文，這是中國學者首次討論敦煌文學資料與中國文學發展的關係，王國維論文中的大部分材料，是由狩野直喜等人提供的，這其中也包括狩野的文章。<sup>16</sup>這自然可以看作日本學者對王國維發生影響的一個例證。有學者認為：「吾國近十年來，俗文學之興起，一方固由於敦煌俗文學之力，而提高文學上之位置；然首先認識敦煌俗文學之價值者，恐推狩野博士為第一人，厥功誠不可沒。」<sup>17</sup>

以上不厭其煩地追溯，主要是說明近代以來，中日的社會文化、學術思潮都經歷了大致相似的過程，這在新學術體系的建立上表顯得尤為明顯，如在西方學術背景下對清代學術的揚棄，研究材料的擴充等；但這一過程並不完全同步，大致而言，在以西方的科學方法和學術觀念研究中國文化方面，日本要先行一步，這種過程的相似使頻繁而有成效的學術交流成為可能，而時間上的落差，也更容易刺激中國學者對日本學者的奮起直追。胡適說治國學必須打破閉關孤立的態度，借鑒歐美日本學術界的成績。如「方法上，西洋學者研究古學的方法早已影響日本學術界了，而我們還在冥行索途的時期。我們此時應該虛心採用他們的科學的方法，補救我們沒有條理系統的習

15 狩野直喜，「中國俗文學史研究底材料」，汪馥泉譯，《中國文學研究譯叢》（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2），頁131。

16 嚴紹盪，《日本中國學史》，頁384-385。

17 傅蕓子，「敦煌俗文學之發見及其展開」，原刊於《中央亞細亞》，1：2（1941.10），後收入《正倉院考古記·白川集》（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頁194。



慣」。<sup>18</sup>這是胡適在二十年代初說的話，到三十年代中期，周作人還是持類似的觀點：「近來甚囂塵上的國故整理，不知道比前漢學家的業績能夠超過多少，到了現在研究國學的人還不得不借助於外邦的支那學，這實在是學人之恥」，<sup>19</sup>這是當時很多學人的一種認識。

### 三、日本的中國小說戲曲研究與胡適的《水滸傳》考證

在明治維新以前，日本的中國文學研究主要表現在對中國文學的模仿創作上（如漢詩和依據《剪燈新話》、《三言》和《水滸傳》而起的讀本小說的繁榮），以及對中國古典文學作品的注解賞析兩方面。但在西潮的衝擊下，以往不受重視的小說戲曲漸漸成為學者研究的物件。坪內逍遙（1859-1935）在 1885 至 1886 年出版的《小說神髓》中第一次提出日本文學史上近代小說概念；東京帝國大學 1903 年將以前的「漢學科」分為「支那哲學」和「支那文學」兩個學科，1912 年鹽谷溫（1878-1962）主持該校中國文學課程；1906 年京都帝國大學在文科大学內設立「支那語學支那文學」講座，1908 年起狩野直喜主持此課程。<sup>20</sup>這些課程漸漸成為比較完整的體系，因為一直由有名學者來主持，也有比較好的連續性，如此使作為近代中國學重要組成部分的中國文學研究在大學裏落地生根。而作為中國文學研究領域中的兩位重要人物狩野直喜和鹽谷溫，對於中國小說戲曲都有深入的研究，他們的學生也均能秉承這一學術傳統。如此不斷的努力，使得文學研究在當時有異軍突起之勢，據《日本期刊三十八種中東方學論文篇目附引得》統計，至 1933 年中國文學研究論文有 82 篇，其中小說、戲曲、敦煌俗文學、神話等研究論文不下 40 篇；而群經（共分九類）只有 90 幾篇，相較而言，經學研究稍顯衰敗之態。

18 胡適，國學季刊發刊宣言，《胡適文存》二集（合肥：黃山書社，1996），頁 12。

19 周作人，日本期刊三十八種中東方學論文篇目附引得序，頁 2。

20 嚴紹巖，《日本中國學史》，頁 349。1928 年到 1932 年鹽谷溫在東京帝大中國文學科擔任的講題和課目有 13 項之多，其中有「中國文學史」、「《西廂記》講習」、「元曲選講習」、「中國文學演習（宋元戲曲史）」等，鈴木虎雄自 1929 年至 1932 年在京都帝大所授的課程有「中國文學史」、「唐宋詩說史」等五門課。見王古魯，最近日本各帝大研究中國學術之概況，《金陵學報》，2：1（1932.5），頁 123。

1887年森槐南(1863-1911)、幸田露伴(1867-1947)、森鷗外(1862-1922)等在《醒醒草》第20卷上共同研討《水滸傳》的作者問題，鹽谷溫在東京帝國大學學習時，師從森槐南，1919年鹽谷溫將其講課筆記《支那文學概論講話》補正出版，「以敘述戲曲小說之發展為主」，其中第6章小說占全書篇幅百分之三十五強，而且鹽谷溫首先在第6章正式採用狩野直喜利用敦煌文獻所得的關於中國通俗小說起源的結論；他還認為《水滸傳》對「我國俗文學影響至大」，並考其源流。<sup>21</sup>狩野直喜在京都帝大講授「中國文學史」時，在《藝文》上發表《水滸傳》與中國戲曲一文，針對二十年前《醒醒草》上關於《水滸傳》作者的討論提出新解，認為雜劇「水滸戲」不是根據小說《水滸傳》改編的，相反，在小說之前，已有許多形式的小「水滸戲」，小說正是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王國維在《元人隔江鬥雜劇》一文中，稱狩野直喜「其言甚確，若《三國演義》則尤有明證，足佐博士之說」。<sup>22</sup>1921年6月胡適在《水滸傳》後考一文結尾有這麼一段話：

青木先生又借給我第一卷第五期《藝文》雜誌(明治四十三年四月)，內有日本帝國大學狩野直喜先生的《水滸傳與支那戲曲》一篇。狩野先生用的材料——從《宣和遺事》到元明的戲曲——差不多完全與我用的材料相同。他的結論是：「或者在大《水滸傳》之前，恐怕還有許多小《水滸傳》，漸漸積累起來，後來成為像現在的《水滸傳》。我們根據這種理由一定要把現在的《水滸傳》出現的時代移後。」這個結論也和我的《水滸傳》考證的結論相同。這種不約而同的印證使我非常高興。<sup>23</sup>

中日著名大學的教授一先一後以「歷史演進法」對《水滸傳》作了考證，表明脫胎於正統經典的考證之法與新的文學觀念已經融合，受這種風氣的影響，由中土傳入日本的珍本戲曲小說不斷地被發現，以此發現為基礎的論文也紛紛問世。<sup>24</sup>中國學者在此前後東渡扶桑訪書，因為「國中發見之資料，

21 有關《水滸傳》在日本的傳播及其影響的論述，可參見李樹果，《日本讀本小說與明清小說》(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第3章 後期讀本與《水滸傳》，頁200-321。

22 王國維，《王國維遺書》(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83)，第5冊，頁17。

23 胡適，《水滸傳》後考(1921.6.11)，《胡適文存》一集(合肥：黃山書社，1996)，頁412-413。

24 斯文會研究部講演會會報 記載：「〔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午後，和漢學會聯合在帝大山上會議所開研究部會，有鹽谷博士底《關於明代小說三言》的講演。博士從一九二五年來苦心搜集底結果，在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上野帝國圖書館等新發見的《古今小說》、《喻世明言》等數種珍貴的書籍，在講演中介紹；並講《三言》底史的發展，《拍案



殆皆可遇而不可求者，故吾人尚宜轉移視線，求之於國外，如研究敦煌卷子者之宜赴倫敦、巴黎，研究小說者之宜赴日本。」<sup>25</sup> 在訪小說戲曲書的行列中，最為人稱道的是董康和孫楷第，還有後來的傅蕓子。

董康自 1926 年至 1936 年在日本四次訪書，後成《書舶庸譚》（又名《董康東遊日記》），他的訪書記錄除記錄經史子集典籍之外，對不登大雅之堂的戲曲小說也頗為用心，有關版式、題識、目錄均詳加抄錄，他在 1927 年 1 月 24 日的日記中說：

勵學之方，行軌至繁，不宜囿於門戶以狹其塗。由經史諸子古今名家撰述以進者固是，小說章回亦未可概斥為非。吾國胡適之好搜輯小說家文字，余亦頗欲撰小說家列傳，苦於所見不多。<sup>26</sup>

胡適（1891-1962）稱董康在書裏所記錄的「許多流傳在日本的舊小說，使將來研究中國文學史的人因此知道史料的所在」。<sup>27</sup> 這些記錄，在胡適眼中的價值主要表現在考證小說作者及版本源流，此種觀點在胡適為孫楷第編撰的《日本東京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序言中亦曾言及：

他〔孫楷第〕每記載一種書，總要設法訪求借觀，依據親身的觀察，詳細記載板刻的形式與內容的異同。這種記載便是為中國小說史立下目錄學的根基。這是最穩固可靠的根基，因為七八百年中的小說發達史都可以在這些板本變遷沿革的痕迹上看出來。

我們可以說：如果沒有日本做了中國舊小說的桃花源，如果不靠日本保存了這許多的舊刻小說，我們決不能真正明瞭中國短篇與長篇小說的發達演變史！我們明白了這一點，方才可以瞭解孫先生此次渡海看小說的使命的重大。<sup>28</sup>

胡適之所以如此稱讚孫楷第這項「用目錄之學做基礎」的工作，大概是這項工作與《國學季刊發刊宣言》旨趣相投的緣故，是對胡適所倡導的「（1）擴大研究的範圍。（2）注意系統的整理。（3）博採參考比較的材料」三大方

---

驚奇》兩刻底存在，和《今古奇觀》的對照，及日本《小說三言》等德川時代底中國小說，——尤其是考證《三言》直系底流傳盛行底實迹。」見汪馥泉譯《中國文學研究譯叢》，頁 65。

25 傅蕓子，《東京觀書記》，《正倉院考古記·白川集》，頁 124。

26 董康，《董康東遊日記》（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頁 38-39。

27 胡適，《書舶庸談序》（1930.6.28），《胡適文存》四集（合肥：黃山書社，1996），頁 4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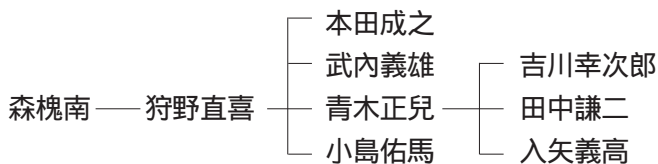
28 胡適，《日本東京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序》（1932.7.24），《胡適文存》四集，頁 292-293。

向的具體實踐；尤其是在小說地位上升的過程中，他能打破國的界限，為中國文學研究開拓了新的疆域，更是為胡適構建白話文學史助一臂之力。事實上，以小說目錄學為根柢，孫楷第借助留存於東瀛的小說和相關論文，在小說考證上也頗有建樹，譬如他寫於1934年的《三國志平話與三國志傳通俗演義》所列的九篇參考文獻中，日本學者撰寫的就有六篇：

1. 鹽谷溫，明代之通俗短篇小說；
2. 鹽谷溫，關於明代小說「三言」；
3. 鹽谷溫，宋明小說傳流表；
4. 長澤規矩也，京本通俗小說與清平山堂；
5. 辛島驍，警世通言三種；
6. 豐田穰，明刊四十卷本《拍案驚奇》及《水滸志傳評林》完本出現

由此亦可見早行一步的日本的中國小說史研究，其研究風氣以及所用的方法和所發現的材料，是當時中國學者不能不正視的。胡適上面的那段話，還明白地透露出他做小說考證的切身體會，他說十幾年前開始做《水滸傳》考證，只知道一種版本，後來國內出現了四種版本，而在孫楷第的書目中，《水滸傳》僅明刻本就有六種之多，「有了這許多本子的詳細記載，我們方才可以作《水滸》演變史的精密研究了」。<sup>29</sup>胡適有這種感歎的緣由是他做《水滸傳》考證，得到了青木正兒（1887-1964）有力的幫助。

在近代日本中國學的譜系中，尤其是在中國文學研究領域內，狩野直喜一系<sup>30</sup>最為引人注目。嚴紹盪稱日本近代中國學中最具價值的研究成果來自於「實證主義學派」，狩野一系是此中代表，他們「師生三代對中國文化史（含文學）業績至巨至大」。<sup>31</sup>



29 胡適，日本東京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序，《胡適文存》四集，頁292。

30 此譜系根據嚴紹盪《日本中國學史》和《先學を語る：狩野直喜博士》（見1971年8月《東方學》第24輯）編制。

31 嚴紹盪，日本近代中國學中的實證論及其價值（要旨），《清華漢學研究》，第3輯，頁118。這種實證學風，從1928年2月京都弘文堂書房出版的《狩野教授還曆紀念支那學論叢》中也能看出，「論叢」收論文33篇，基本上是考證性質的。

青木正兒是狩野直喜在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学的第一屆學生，他對中國戲曲發生興趣，始於狩野主持「元曲講座」之時，後又在狩野的指導下依照《北曲譜》《中原音韻》等讀曲文。在此後的幾十年間，師生之間一直保持很深厚情誼。他之所以能從事於戲曲小說研究，有狩野的影響，也有他青少年時代因閱讀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中關於中國小說戲曲的論述而受到的刺激，更有時代思潮的鼓動。青木正兒之子中村喬對後一點曾有文字論及：

家父嫌惡古道德與觀念之束縛，在思想上不好孔孟之學，而似偏愛莊。余意正是由於此點而對吳虞之非儒論大呼痛快也。在文學方面，他對過去目為正道的以詩為中心之研究素抱懷疑態度，青年時期即開始對日本之江戶俗文學感興趣。即對中國文學之研究亦只注目於與庶民生活密切結合之俗文學。以此作為出發點，對中國之生活文化感到極大興趣，並在此一方面進行研究。余意家父之所以亦能較早注目於中國之新文學運動，其原因亦即在此。<sup>32</sup>

青木正兒早年的思想狀況和胡適等人在總體上是一致的，他對胡適的關注是從文學革命開始的。1920年9月1日，青木正兒與本田成之（1882-1945）、小島佑馬（1881-1966）、神田喜一郎（1897-1984）、倉石武四郎（1897-1975）等一批新進學者得到前輩狩野直喜、鈴木虎雄（1878-1963）、內藤湖南、桑原隲藏（1870-1931）的援助，創辦一種純粹研究中國學術的雜誌《支那學》，青木正兒在該雜誌第1卷第1至3號上發表長文《以胡適為中心的文學革命》，正是以「破壞中國舊思想」，「輸入歐洲新思想」為基點，他們在幾回書信往來之後，話題自然轉移到《水滸傳》上來。1920年8月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新式標點《水滸傳》，此書有胡適所作的《水滸傳考證》，青木正兒很快就看到胡適的文章。

我讀先生的大著《水滸傳考證》很佩服。前數年，我師狩野君山（直喜）先生亦有同一議論；蓋同工異曲。（君山先生的論載於京都文科大学的雜誌《藝文》，我現在沒有這個雜誌，後來搜得給先生一看罷！）我把先生的高論告訴君山先生，君山先生很高興；所以把那大著借給君山先生看去了。君山先生很推稱先生的頭腦明晰。<sup>33</sup>

32 中村喬致唐振常函（1981.1.21），唐振常《吳虞與青木正兒》，《中華文史論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頁290-291。

33 青木正兒致胡適函（1920.11.20），耿雲志《關於胡適與青木正兒的來往書信》，《胡適研究叢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第1輯，頁309。

狩野直喜（君山）的《水滸傳與支那戲曲》<sup>34</sup>和胡適的《水滸傳考證》所用的研究方法可謂不約而同，都注意到從「水滸」戲、「水滸」故事演變到「水滸」小說的漸進過程，而且所用的資料也有不少相同的，如《宣和遺事》，特別是《元曲選》中的《雙獻頭》、《燕青博魚》、《還牢末》、《爭報恩》、《李逵負荊》等戲曲。狩野認為作者是在明朝初年，胡適的斷定是：「（一）施耐庵決不是宋元兩朝人。（二）他決不是明朝初年的人：因為這三個時代不曾產生出這七十回本的《水滸傳》。（三）從文學進化的觀點來看起來，這部《水滸傳》，應該產生在周憲王的雜劇與《金瓶梅》之間。」<sup>35</sup>同狩野的文章比較，胡適這篇文章尤顯豐富細密，他在文章中說明為什麼要刪去七十回本中金聖歎的總評和夾評，並考察了宋元兩代水滸故事發達的原因，以及元朝「水滸」戲對「水滸」小說形成過程中的累積作用，又根據幾種七十回本對《水滸傳》形成及版本源流作出了一種推論，認為「『施耐庵』是明朝中葉一個文學大家的假名」，最後他將七十回本分為十大段，在分段解析的基礎上闡明《水滸傳》「不但是集水滸故事的大成，並且是中國白話文學完全成立的一個大紀元」。<sup>36</sup>但在寫完此文的十個月後，胡適訪求到（或得知有）六種版本的《水滸》（見表一）：

表一：胡適訪求的各種版本《水滸傳》

李卓吾批點《忠義水滸傳》百回本的第一至十回	得自青木正兒
百回本《忠義水滸傳》 <sup>37</sup> 日本譯本	得自青木正兒
百十五回本《忠義水滸傳》	胡適有兩種，其中一種是鈴木虎雄藏本的翻刻本
百二十四回本《水滸傳》	
百十回本《忠義水滸傳》	鈴木虎雄藏，青木正兒為胡適抄得回目與序例
百二十回本《忠義水滸全書》	藏於京都府立圖書館，青木正兒為胡適抄得回目與序例

胡適稱《水滸傳》時代考定是中國近世文學史上一個重要問題，他自然清楚這部小說在白話文學史上的位置及其在民眾中的影響，同時也是他為上

34 狩野直喜，《水滸傳與支那戲曲》，《藝文》，1：5（1910.7）

35 胡適，《水滸傳考證》（1920.7.27），《胡適文存》一集，頁387-388。

36 胡適，《水滸傳考證》，《胡適文存》一集，頁392。

37 《胡適的日記》1921年5月19日記：「此係根據百回本的《忠義水滸傳》作底本的。百回本既不易得，此本可以考見百回本的內容，故很可寶貴」，頁55。

海亞東圖書館整理的章回小說中的第一部，所以他捨得多費時間與精力用四五萬字的篇幅來做考證。胡適的《水滸傳後考》可算是二十世紀早期中日學術交流的一個典範，胡適有一種開放的學術態度，他說：「我這幾篇小說考證裏的結論也許都是錯的，但我自信這一點研究的態度是決不會錯的」，這種從善如流的態度就是打破遺傳的成見，放棄主觀的我見，處處尊重物觀的證據，<sup>38</sup>正是由於此點，他才會有《水滸傳考證》後的《水滸傳後考》，而且在幾年後因為又有新的版本意見和其他學者的質疑，胡適又有大轉變的《水滸傳新考》（即《百二十回忠義水滸傳序》）。胡適對青木正兒的幫助，在《水滸傳後考》一文結尾處深表感謝：

這十個月以來發現的新材料居然證實了我的幾個大膽的假設，這自然是我歡喜的。但我更歡喜的，是我假定的那些結論之中有幾個誤點，現在有了新材料的幫助，居然都得著有價值的糾正。我最感謝我的朋友青木正兒先生，他把我搜求《水滸》材料的事看作他自己的事一樣；他對於《水滸》的熱心，真使我十分感激。如果中國愛讀《水滸》的人都能像青木先生那樣熱心，這個《水滸》問題不日就可以解決了。<sup>39</sup>

胡適在這十個月前後所寫的兩篇考證文章裏，有關《水滸傳》版本源流在總體上並沒有多大改變，那就是仍假定明初有幼稚的「原百回本」，嘉靖郭武定本前有一個「七十回本」。他之所以沒有放棄這個幼稚的「原百回本」，這是根據他的「文學進化的觀點」推測出來的，因為「元人的文學程度實在很幼稚，才知道元代只是白話文學的草創時代，決不是白話文學的成人時代」，故《水滸傳》不能產生於元代，明初的《水滸傳》也很幼稚，只有到明中葉才能出現成熟的《水滸傳》。如此推論，值得商榷，<sup>40</sup>此處暫不展開。

#### 四、整理國故的餘波以及章學誠和崔述的被發現

二十世紀前三十年中日學術交流中能保持良好的互動狀態，是因為雙方在考證學風上的一致（前文已述及）。吉川幸次郎說：「所謂考證學，在日

38 胡適，《水滸傳後考》，頁413。

39 胡適，《水滸傳後考》，頁412。

40 不少學者將《水滸傳》成書年代定在元末明初，尤其是在明洪武年間。而王利器將成書年代稍稍提前，他在《水滸全傳是怎樣纂修的》一文舉出七條內證，定《水滸全傳》成書時代在元代，見《當代學者自選文庫·王利器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頁466-468。



本，總認為在文獻對證之處，一定要有實物的證據，否則，不能叫考證學。」  
 「當時在日本作為權威看待的羅振玉、王國維兩人的學問，從哪個方面看都是發現，換句話說是傾向資料主義的。」<sup>41</sup> 這種資料主義的傾向，或者更進一步的建立在最新資料的新解釋學，到胡適倡導整理國故時，更加明顯，而胡適與日本學界的交流也基本上是以此為中心的，這從表二<sup>42</sup> 中即能看出，同時，這種交流又不僅限於資料，還牽涉到更多的中日學術界的人和事。

表二 胡適與青木正兒論學書信提要

胡適致青木	1920.9.25	對青木寄贈《支那學》一卷一號表示謝意。
青木致胡適	1920.10.1	表示對文學革命的濃厚興趣。
青木致胡適	1920.10.26	寄贈《金冬心之藝術》、《品梅記》。
胡適致青木	1920.11.11	告知將兩冊《支那學》借給周氏兄弟，認為青木敘述文學革命運動取材確當，見解平允。
胡適致青木	1920.11.18	告訴青木《金冬心之藝術》中所引用詩句讀有誤。
青木致胡適	1920.11.20	謝胡適所寄《嘗試集》，並告知狩野已讀《水滸傳考證》。
青木致胡適	1920.11.28	告知即將刊出的《本邦支那學革新的第一步》一文大意。
胡適致青木	1920.12.14	請青木在日本覓姚際恒《古今偽書考》、《九經通論》、《庸言錄》，求內藤《章實齋年譜》並所藏鈔本章氏遺書目錄，以及狩野的《水滸考》。並寄贈《儒林外史》。
青木致胡適	1920.12.17	請胡適為《支那學》寫稿，並議將其辦成「一個打破國境的學術雜誌」。
青木致胡適	1920.12.21	答應問內藤關於《章氏遺書》的事。
青木致胡適	1920.12.21	收到《儒林外史》，佩服胡適所寫的《吳敬梓傳》。
胡適致青木	1920.12.24	贊成將《支那學》變成「打破國境」的雜誌。
青木致胡適	1920.12.25	告知《古今偽書考》可求，而《九經通論》、《庸言錄》無人知曉，請胡適查考日本正德享保時岡島璞所學的中國話是何種方言，又提及岡島璞曾翻譯《水滸傳》等書。
胡適致青木	1921.1.24	請青木求岡島璞訓點刊佈的《水滸傳》，並望購買日本《水滸傳》。告知浙江圖書館印《章氏遺書》，並擬做《吳敬梓新傳》。
青木致胡適	1921.1.27	告知抄好內藤的章氏遺書目錄，又請胡適覓抄沈曾桐藏章氏遺書目錄給內藤。
青木致胡適	1921.1.29	告知《支那學》同人藏有《詩經通論》。
胡適致青木	1921.2.3	給青木抄錄《章氏遺書》內藤本比自藏多出的篇目，並請青木找其中禮教、所見兩篇原文。

41 吉川幸次郎，《我的留學記》，頁79。

42 此表根據耿雲志《胡適與青木正兒來往書信二十七通》編製，見《胡適研究叢刊》，第1輯，頁302-329。

胡適致青木	1921.2.4	已請人翻譯內藤 章實齋年譜，並訂正其中幾處錯誤，準備讓顧頡剛整理《東壁遺書》。
胡適致青木	1921.2.8	感謝青木寄贈《忠義水滸傳》二冊，並請他訪求一部百二十回的《水滸傳全書》和百十回的《忠義水滸傳》，準備為《水滸傳》做一可靠的考證。
青木致胡適	1921.2.17	感謝胡適寄贈新印的《章氏遺書》，並告知《東壁遺書》及百二十回本《水滸》雖經訪求，但未能得到。
青木致胡適	1921.3.15	告知寄上《支那學》二月號並《藝文》(上有狩野《水滸傳》考證文)，自己借覽姚氏《詩經通論》，並訪求其《好古堂家藏書畫記》。
青木致胡適	1921.3.20	感謝胡適所寄《英雄譜》，並擬以此與《合刻水滸三國全傳》比較。
青木致胡適	1921.4.8	得知所抄百二十回本《水滸傳》凡例有益於胡適的考證，高興至極。並答應訪求岡島璞《水滸》譯本，擬做《水滸》在日本文學史上的影響。又告知神田喜一郎的《四部叢刊底本論》在中國有意外反響，神田很高興。
青木致胡適	1921.4.17	感謝胡適所寄《章氏遺書》。
胡適致青木	1921.5.19	告知收到百十回本《水滸傳》校記及《忠義水滸傳》譯本。認為青木考定百十回本《英雄譜》為明末刻本大概不錯。
青木致胡適	1921.6.1	感謝胡適所寄《紅樓夢》，並告知狩野曾用英文做過《水滸傳考證》，並擬在《支那學》上介紹胡適的考證文章。告知狩野推稱胡適的《紅樓夢》考證精核，並擬寄上狩野的英文論文《紅樓夢考證》。
青木致胡適	1922.2.17	感謝胡適所寄《胡適文存》一集，想替胡適訪求一部影印本《唐三藏取經詩話》，未得。寄贈日本古代白話小說《海外奇談》。

青木正兒在為胡適訪求資料時，他的學術興趣也在不知不覺中受到胡適的影響。胡適在 1961 年 4 月 16 日與胡頌平的談話中提及他與日本戰前漢學界的關係，胡頌平的紀錄是：「『支那學』的中心人物內藤湖南，當年受了先生的影響最大；那時年輕一輩的如神田、青木等人，現在也有六十多歲，都是早已成名了。這『支那學』一派完全受了先生的影響。」<sup>43</sup> 這段話雖稍有誇大其詞之嫌，但也多少反映了一些實情。如青木正兒在看完胡適的《吳敬梓傳》（1920 年 11 月），準備以此為素材，寫一篇以乾隆時代揚州為背景的小說；他替胡適訪求姚際恒著作時，也「借覽姚氏《詩經通論》，又訪求他的《好古堂家藏書畫記》；他不但是一個懷疑的學究，並且這等趣味的人則我尤所尊崇的」。<sup>44</sup> 胡適指出青木正兒所著《金冬心之藝術》中《雙禽曲》等三首詩詞的句讀之誤，這對青木有不小的觸動，他認為「我們日本人的讀書法，

43 胡頌平，《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3），頁 149。

44 青木正兒致胡適函（1921.3.15），見耿雲志《關於胡適與青木正兒的來往書信》，頁 325。

把中國文牽強日本的文法，音韻不諧的。因為這個原故，我們所求支那學的時候，不便不少，就中研究韻文為尤甚。我們應該廢棄這個偶像，學習今日在中國音讀法；否則我們的讀書力，進步不可企及：這是日本支那學者流的第一步。<sup>45</sup> 這一論點的展開論述，就是青木刊於《支那學》第1卷第5號（1921年1月）上的「本邦支那學革新的第一步」。青木正兒得到胡適贈送的百十五回本《忠義水滸傳》（與《三國演義》合刻，合稱《英雄譜》，還有百十回本的《忠義水滸傳》，並作了校讀。或許是學其師狩野直喜的《水滸傳與支那戲曲》以及胡適的《水滸傳考證》的影響，他著手撰文清理《水滸傳》在日本的傳播及其影響：

我此時要做日本文學史上的《水滸》一篇小論，做成之後，在《支那學》上給你看看。那《水滸》不但在中國文學史上〔是〕重要的作品，並且在日本文學史上影響很多了；而這個現象的起點是那岡島的譯本，一出此書，多數翻案（脫胎於《水滸》）的小說追從來了。<sup>46</sup>

在此前不久，青木正兒因要準備做岡島璞（1675-1728）的小傳，請胡適查考岡島璞學的是何種中國方言，似與此文有關。青木正兒在所撰《水滸傳》在日本文學史上的傳播和影響（成於1921年4月8日）一文篇首提到狩野和胡適的文章，並對胡適考證之精密大加讚賞，在文中亦述及胡適正在進行的《水滸傳》「後考」。青木此文，用探源溯流之法，首先查明日本現存《水滸傳》版本情況，次及《水滸傳》何時傳入；<sup>47</sup> 再及傳入之後，是如何經岡島冠山的訓點和翻譯，廣泛流傳於民間，並隨之出現解釋《水滸傳》辭彙的工具書。<sup>48</sup> 稍後，青木的一篇專門討論「本邦研究支那白話文學的先覺者」岡島璞的文章也在《支那學》上刊出，在文中青木對岡島璞的生平，尤其是

45 青木正兒致胡適函（1920.11.28），見耿雲志《關於胡適與青木正兒的來往書信》，頁309。

46 青木正兒致胡適函（1921.4.8），見耿雲志《關於胡適與青木正兒的來往書信》，頁324。

47 對於這一點，他以鈴木虎雄藏《二刻英雄譜》中的百十回本《水滸》加以探討，鈴木認為此本是清初刻本，青木認為是萬曆刻本，胡適據序中「東望而三經略之魄尚震，西望而兩開府之魂未招」而定初刻在崇禎年間。青木後在信中及其他文章中，以胡適說為是。嚴紹盪認為《二刻英雄譜》傳入日本，不晚於1676年，見《漢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頁51；李樹果以德川幕府《御文庫目錄》於寬永十六己卯年（1639）收入《水滸全傳》，正保三丙戌年（1646）又登記《英雄譜》，將《水滸傳》傳入日本時間作了進一步的斷定，見《日本讀本小說與明清小說》，頁200。

48 青木正兒，《水滸傳在日本文學史上的傳播及其影響》，《支那學》，1：9（1921.5），頁29-43。

著述目錄詳加考證，指出他因編著和翻譯《通俗元明清軍談》、《唐話纂要》、《唐音雅俗語類》、《唐語使用》、《華音唐詩選》、《唐音俗話問答》、《通俗三國志》、《忠義水滸傳》而在研究中國白話文學領域佔有的重要位置。<sup>49</sup> 青木治學當然有他從狩野那裏繼承來的傳統，但似乎也不能排除在與胡適的頻繁交往中而受到胡適的影響，特別是他在與胡適的交往過程中去梳理《水滸傳》在日本文學史上的影響，以及考證岡島璞在支那白話文學研究方面的貢獻，可視為整理國故在東瀛的餘波。

前文已提到創刊於 1920 年 9 月的《支那學》雜誌，有意打破國境，刊登中國學者的文章。胡適對此深表贊同，實際上，《支那學》也刊發了不少中國學者如羅振玉、王國維、吳虞、孫人和、胡玉縉的論文，它對新起的學者，尤其是對以胡適為中心的整理國故運動也頗為關注：

1. 青木正兒，以胡適為中心的文學革命，刊於第 1 卷第 1 號至 3 號；
2. 青木正兒，胡適《嘗試集》，同上，見「新刊紹介」專欄；
3. 青木正兒，新式標點《水滸》，刊於第 1 卷第 3 號「新刊紹介」專欄；
4. 岡崎文夫，關於九流不出於王官的討論，刊於第 1 卷第 4 號；
5. 青木正兒，新式標點《儒林外史》讀後，刊於第 1 卷第 7 號；
6. 青木正兒，章氏遺書三十四卷，刊於第 1 卷第 7 號「新書紹介」；
7. 青木正兒，胡適著紅樓夢考證讀後，刊於第 1 卷第 11 號；<sup>50</sup>
8. 青木正兒，吳虞的儒教破壞論，刊於第 2 卷第 3 號；
9. 小島佑馬，費密的遺書，刊於第 2 卷第 6 號；
10. 內藤湖南，胡適之君新著《章實齋年譜》讀後，第 2 卷第 9 號；
11. 青木正兒，先秦名學史，第 3 卷第 4 號「新刊紹介」；
12. 神田喜一郎，支那學界的近況，詳細介紹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的創刊，刊登創刊於目錄，刊於第 3 卷第 6 號；
13. 青木正兒，百回本《水滸》（李玄伯編），刊於第 4 卷第 2 號「新書紹介」專欄；
14. 岡崎文夫，崔述對於禪讓之見解，刊於第 4 卷第 3 號。

就《支那學》而言，將胡適的學術研究成果介紹到日本，以青木正兒出

49 青木正兒，岡島冠山與支那白話文學，《支那學》，1：10（1921.6），頁 31-42。

50 青木正兒在《中國文學概說》第 5 章 戲曲小說學 中對胡適定《紅樓夢》是曹雪芹自敘傳說也有介紹，認為「此說是最合理的」。同時，在本章「選讀書目」中對上海亞東圖書館新式標點的斷句本《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儒林外史》等小說予以推薦。《中國文學概說》在日本至遲在 1936 年出版，1938 年開明書店出版隋樹森中譯本，此據重慶出版社 1982 年重排本，頁 157。

力最多，而且頗多稱賞之語。青木 1922 年、1925 年至 1926 年到中國學習，不然，《支那學》上類似的評介會更為頻繁，而且更有連續性。可以這麼說，他是二十年代初中日學術交流的「媒介人物」，<sup>51</sup> 這從「胡適與青木正兒論學書信提要表」也能得到證示，落到實處來說，胡適與日本學界交流也主要是以書信為主，而且最見成效。1927 年 4 月，胡適自美洲返回，途中在日本停留了二十餘天，也會見東京大學和京都大學的一些學者，但行蹤匆忙，還有語言不通之處，故交流效果並不理想。<sup>52</sup> 如此，就更有必要提及書信交流中的兩個最重要的例證，即圍繞著《章氏遺書》和《崔東壁遺書》而引發的學術交流。

內藤湖南的《章實齋先生年譜》刊於《支那學》第 1 卷第 3 號（1920 年 11 月）和第 1 卷第 4 號（1920 年 12 月），全文共一萬餘字。《年譜》前為乾嘉之際學術思想背景簡介和撰寫緣起，內藤對能融會貫通疏明大例的《述學》評價較高，汪中這部未能完成的「古代學術史」，可能是因其總結古代有關學制、學術的盛衰興廢，而引起內藤的興趣，故又特意表彰與戴震、汪中同時代的章學誠，認為《文史通義》在經史子集各部綜括批判的基礎上建立起一種新的史論，其源可溯至劉向、劉歆父子，以及劉勰《文心雕龍》、劉知幾《史通》、鄭樵《通志》，但自創體系是從章學誠開始的。<sup>53</sup>

胡適在青木贈送的《支那學》雜誌上讀到《年譜》後，得知內藤藏有鈔本章氏遺書 18 冊，便託青木抄出一份目錄，並希望內藤刊出遺書，胡適此時已經開始搜集章氏遺文，故對相關資料全神貫注。他將《中國學報》上所刊出的新材料《史籍考目》及《史籍考序例》，以及《年譜》中的幾處疏誤，託青木告訴內藤，青木回信說：

對於 章實齋年譜 你的忠言，使他〔內藤〕十分感謝，你的正誤不錯。他說嘉慶四年的干支確是己未，是一時誤寫，而嘉慶三年因為沒有要緊的事，所以省略了，不是誤脫一年的事。恰好把你說的《史籍考》一事，補正這一年起來，尤為妙計。<sup>54</sup>

51 此詞源自余英時《中國文化的海外媒介》一文，見《錢穆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頁 187。

52 桑兵，胡適與國際漢學界，《國學與漢學：近代中外學界交往錄》（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頁 187-189。

53 內藤湖南，《章實齋先生年譜》，《支那學》，1：3（1920.11），頁 16-17。《年譜》後收入所著《研幾小錄》（又名《支那學叢考》），弘文堂書房 1928 年版。

54 青木正兒致胡適函（1921.2.17），見耿雲志《關於胡適與青木正兒的來往書信》，頁 321。



1922年1月商務印書館出版了胡適的《章實齋先生年譜》，與內藤的《年譜》時間相差一年，胡適的年譜後經姚名達增補，到1931年再版時，已有七萬餘字，已大大超過內藤之作。胡適覺得內藤之作過於簡略，「只有一些瑣碎的事實，不能表現他的思想學說變遷沿革的次序」，故自創年譜新體例，將反映章氏思想變遷的著作摘錄分年編入，同時編入章氏批評其他學者的文字，而且胡適還將自己對章氏的看法編入年譜。對此內藤作出反應，他認為胡適創例，不失為一家之見，然年譜重在簡明可信。胡適的《年譜》雖說後來居上，但畢竟脫胎於內藤之作。周一良認為「胡適姚名達兩氏之從事於斯皆為〔內藤〕先生所興起」。<sup>55</sup>胡適自述撰寫《年譜》的經過時，也承認這一點：

最可使我們慚愧的，是第一次作 章實齋年譜 的乃是一位外國的學者。我讀了內藤先生作的 年譜，知道他藏有一部抄本《章氏遺書》十八冊，又承我的朋友青木正兒先生替我把這部《遺書》的目錄全抄了寄來。那時我本想設法借抄這部《遺書》，忽然聽說浙江圖書館已把一部抄本的《章氏遺書》排印出來了。我把這部《遺書》讀完之後，知道內藤先生用的年譜的材料大都在這書裏面，我就隨時在 內藤譜 上注出每條的出處。有時偶然校出 內藤譜 的遺漏處，或錯誤處，我也隨手注在上面。我那時不過想做一部 內藤譜 的「疏證」。後來我又在別處找出一些材料，我也附記在一處。批註太多了，原書竟寫不下了，我不得不想一個法子，另作一本新年譜。<sup>56</sup>

內藤湖南在看到胡適1922年版的《章實齋先生年譜》之後，隨即寫有 讀胡適之君新著《章實齋年譜》。在這篇文章中，內藤將胡適所匡正增補的15處列舉出來，<sup>57</sup>並表示謝意，同時他又將胡適《年譜》中可疑之處列出，下面就通過三種版本的《年譜》對比，看看胡適是如何回應內藤的批評。

1. 朱筠弟子李威 從遊記 中，記學誠在朱門下姍笑，無弟子之禮。內藤以此事繫於朱筠為安徽學政之時，胡適繫於乾隆三十二年。但李威記此事，如目睹此事而記，李威從遊於朱筠，似在乾隆三十五年之後。〔按：內藤 年譜 將此條繫於乾隆三十七年，胡適1922年版《年譜》繫此條於乾隆三十三年，1931年版《年譜》繫此條於乾隆四十年。〕

55 周一良，日本內藤湖南先生在中國史學上之貢獻：《研幾小錄》及《讀史叢錄》提要，《史學年報》，2：1（1934.9），頁166。

56 胡適，章實齋先生年譜序，《胡適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第7冊，頁25-26。

57 內藤湖南，讀胡適之君新著《章實齋年譜》，《支那學》，2：9（1922.5），頁1-16。內藤 年譜 還有一處錯誤，胡適在1931年版《年譜》中指出：乾隆五十一年章氏「仍在蓮池書院十二月十日（《內藤譜》作二十日）有 月夜遊蓮池記」。

2. 內藤根據 金地山印譜序，定章學誠乾隆三十九年應浙江鄉試。〔按：胡適 1922 年版《年譜》無此條，1931 年版《年譜》補入「秋，與金友蓮自和州泛如溪，渡高淳巨浸，曉浮鸚脰湖，過嘉興至杭州，應浙江鄉試，不中。過會稽，抵寧波。（金地山印譜序、杜燮均家傳、童孺人家傳）」〕
3. 章學誠主講永平敬勝書院，內藤認為應記之於乾隆四十七年，胡君記之入於四十八年病癒後，可據 滄雲山房書日記、丁巳歲暮書懷詩注、文學敘例、丙辰割記等斷定。〔按：胡適 1922 年版《年譜》無此條，1931 年版《年譜》補入，而於乾隆四十八年下保留「病癒後，回永平主講敬勝書院」。〕
4. 乾隆五十年條下，胡適引用 丁巳歲暮懷詩注，記章氏長孫女及第三子殤於保安。內藤認為胡適將第五子誤為第三子。〔按：胡適 1931 年版《年譜》已改正。〕
5. 章學誠 八座雲說 記戊午（嘉慶三年）冬日曾賓招飲同人時，章學誠亦參加。內藤指出，他和胡適的《年譜》（1922 年版）皆遺漏此條。〔按：1931 年版《年譜》增補一條 1922 年版所無的記錄：「是年冬，在揚州，主于曾燠官署。立冬日，作 八座雲說。」〕

就資料而言，胡適得益於內藤不少，在《年譜》的撰寫補訂方面，雙方都有平和的心態，很快接納對方的批評，並在此基礎上將學術研究更推進一層，上面列舉的胡適對內藤意見的積極反應，就足夠說明這一點。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稱胡適「用清儒方法治學，有正統派遺風」，正統派學風有何特色？他列出十點來闡明，其中第八點是：

辯詰以本問題為範圍，詞旨務篤實溫厚，雖不肯枉自己意見，同時仍尊重別人意見；有盛氣凌轍，或支離牽涉或影射譏笑者，認為不德。<sup>58</sup>

持此條來衡量胡適與內藤在學術上的往來商討，極為妥貼。日本的中國學和中國現代學術，都得益於清代樸學，不單指研究方法，還涉及到學術風氣層面，於此亦可稍見。正是由於內藤的倡導，以及胡適的深入拓展，章學誠的學術思想很快就成為學界眾人關注的題目，「北京大學招生，有投考者必先讀章學誠《文史通義》一條」。<sup>59</sup> 1937 年以前的相關論文著作，大多由內藤特別是胡適而起；而研究崔東壁的，則是由那珂通世（1851-1908）與胡適推波助瀾。據 乾嘉學術研究論著目錄 統計，成於胡適《章學齋年譜》

58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見夏曉虹編校，《中國現代學術經典·梁啟超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頁164。

59 錢穆，記鈔本章氏遺書，《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0），第8冊，頁281。

(1922年1月初版)之前的論著有一篇,成於其後的有26篇,26篇中與《章實齋》有直接關聯的有11篇;在研究崔東壁的論文著作中,成於胡適 科學的古史家崔述(1923年4月)之前的有兩篇,成於其後的有16篇,其中與胡適相關的有四篇。<sup>60</sup> 在研究章學誠的學者中,值得注意的是姚名達,他說:「民國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因我父親的指示,去買了一本胡適之先生做的《章實齋年譜》,到四月二十三日看完以後,才恍惚的想去研究章先生。」<sup>61</sup> 姚名達的幾種著作,如刊於《國學月報》的 章實齋年譜、 章實齋遺書敘目 以及 章實齋之史學 ,可視為他在胡適影響下研究的結果。與章學誠一同走進現代學術視野的還有崔東壁,而崔東壁的被發現,日本也要比中國至少早十年,胡適、顧頡剛功不可沒,同時也不能撇開日本學界的影響。

本文第二部分已討論過日本近代學風的轉變,以及實證為中心近代中國學的興起的原因。在這種學術氛圍下,至20世紀初年,日本中國學領域中出現了古史辨偽理論,對此理論上有建樹的學者有東京大學史學科教授白鳥庫吉,他於1909年在《東洋時報》(第131號)上發表 中國古傳說的研究 ,<sup>62</sup> 首次在日本提出「堯舜禹非實在人物論」,繼之有內藤湖南,他在1921年3月發表 尚書稽疑 ,1922年2月發表 禹貢製作的時代 ,還有1923年發表的 易疑 等論文,內藤的辨偽思想資源最直接的可能有兩個,其一是江戶時代學者富永仲基的「加上原則」,<sup>63</sup> 其二是乾嘉學術,尤其是崔

60 據汪嘉玲、游均昆編, 乾嘉學術研究論著目錄(1900-1993)下 統計,《中國文哲研究通訊》,4:2(1994.6),頁56-80。

61 姚名達, 章實齋先生年譜序,《胡適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第7冊,頁19。

62 此文收入劉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北京:中華書局,1992),第1卷,頁1-9。

63 「加上原則」源於富永仲基的《出定後語》(1744年版)一書。此書在研究原始佛教的成立和發展過程中指出,早期婆羅門教認為從苦界脫離而升入得以解脫的天國只有一重,但後起的婆羅門新宗派,為勝過舊教,將自己的天國放在舊教的天國之上,於是,愈後出的教派,「天」的重數愈多,以至有二十八重,三十三重之多,富永仲基稱此種現象為宗教起源上的「加上原則」。內藤對富永仲基的學說最為傾心,曾搜集其遺文,並於1924年系統介紹其學說,稱「加上原則」是「非常偉大的學說」。是「一種從思想的積累上來思考問題,根據思想的發展來發現歷史的前後的方法,這種方法對於研究沒有歷史記錄的時代的歷史,是再好不過的方法」。見錢婉約「層累地造成說」與「加上原則」:中日近代史學上之古史辨偽理論,載《人文論叢》(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0),1999年卷,頁438-439。

### 述的學說。賀昌群說：

明治三十二年當光緒二十六年拳匪之亂，狩野直喜氏由北京離亂中攜取陳氏遺經樓刊《崔東壁遺書》《考信錄》二十五卷，遯歸日本，持贈那珂氏，那珂氏讀之極佩其議論考證之卓越，擬為翻印，其消息露布於《史學雜誌》（第十一編第十二號），當時內藤虎次郎氏尚為大阪《朝日新聞》之記者，見該雜誌所載與其所藏頗有異同，知狩野所得之書必有殘缺。乃就內藤所藏，改《考信錄》為三十六卷，合《考信翼錄》十卷其他九卷為五十五卷，歸史學會刊印，至明治三十七年《崔東壁遺書》全部共四冊出版，因而那珂氏乃集中全力於中國上古史之研究，學風丕變，以後白鳥氏之「堯禹抹殺論」未始不脫胎於此，其時期尚先於吾國胡適、顧頡剛諸氏之重視崔氏遺書也。<sup>64</sup>

崔東壁的學說在 19 世紀已引起日本學者的注意，據中山久四郎介紹，江戶幕府時代考證學家北慎言在其《梅園日記》（1845 年刻成）卷四中有讀 東壁遺書·商考信錄 的記錄，至 1902 年有那珂通世的 考信錄解題 刊於《史學雜誌》第 13 編第 7 號，自此之後新起學者對崔氏更加關注。那珂通世更是「以於日本學界介紹崔述名著之功績為自負」，東京高等師範學校也以《崔東壁遺書》為漢史、漢文教科書。<sup>65</sup> 1920 年諸橋轍次到中國訪學，就與曾廣鈞（1866-1929）談到過崔氏的《讀風偶識》，<sup>66</sup> 1922 年 8 月 26 日胡適的日記有如下記錄：

日本學者今關壽齋來談。他判送我一部自作的《宋元明清儒學年表》。我們談甚久。他說，二十年前，日本人受崔述的影響最大；近十年來，受汪中的影響最大：崔述的影響以經治史，汪中的影響是以史治經。其實日本人史學上的大進步大部分是西洋學術的影響，他未免過推汪中了。他又說：崔述過信「經」。此言甚是。<sup>67</sup>

這是反映日本學者認識崔述的最好紀錄，而胡適對崔述的留意大致是在兩年

64 賀昌群，日本學術界之「支那學研究」，頁 14-15。那珂通世所藏崔氏遺書得自狩野直喜，「深喜著者議論之高明精確，進而求其完備之書，遂熟讀校定之」。又可見李慶《崔東壁遺書》和二十世紀初中日兩國的「疑古」思潮，載《學術集林》（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7），卷 10，頁 315。又據《狩野直喜博士年譜》，狩野 1900 年 4 月至 8 月到北京學習，崔氏遺書即在此期間購得。

65 中山久四郎著，連清吉譯，《清朝考證學風與近世日本》，頁 1-2。

66 「諸橋：清儒東壁有《讀風偶識》之著。以史實為據，多據古人註疏。高見以為何如？」曾：崔東壁見識頗有可取處。」見 曾廣鈞和諸橋轍次的筆談（1920 年），載李慶編注，《東瀛遺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稀見史料輯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頁 160。

67 見《胡適的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437。

前，問題是由顧頡剛提出的。1920年顧頡剛欲編《國故叢書》，便於12月15日寫信向胡適借沒有看過的《東壁遺書》，還有林伯桐的《竹柏山房叢書》，胡適於12月18日回信說有林氏的書而無崔氏的書，「崔氏書有日本人那珂通世的新式圈點校印本，可惜此時不易得了。我已托人尋去。」<sup>68</sup>中日近世學術史上的辨偽理論有頗為相似的發展過程，其中共同憑藉的資源是崔述的學說，但胡適、顧頡剛的古史觀的形成有沒有受到日本方面的影響呢？這一點難以作出明晰的判斷，因為中國的辨偽史學發展到胡、顧，自有其內在的理路，儘管它遲於日本十餘年。不過，其中有一點可以斷定的是，在中國現代辨偽史學的醞釀過程中，日本學者對崔述學說的重視，至少給還未讀過崔述著作的胡適和顧頡剛一種暗示，那就是崔述不可忽視。1921年1月間，胡適已得到《畿輔叢書》本《東壁遺書》，他寫信告訴顧頡剛，以為他的「偽史考」，可繼崔述而起。顧頡剛也在訪崔述的《考信錄》，他對胡適說：「日本刻本如買到，我的標點便可事半功倍了。」<sup>69</sup>故胡適隨即寫信給青木正兒：

又有一事奉託：我想叫我的學生們「整理」（這裏我們很流行的一個字，例如「整理國故」）崔述的《東壁遺書》，預備出一個「新式標點」的本子。聽說日本史學會曾出了一部《東壁遺書》的「點讀加引號」的本子，校刻的很好。不知此本還可求得嗎？<sup>70</sup>

在胡適之前，蕓照在《東方雜誌》第2卷第7期（1905年7月）刊發《崔東壁學術發微》，文中提及那珂通世重印崔氏遺書一事；劉師培在光緒三十三年（1907）《國粹學報》第34期上刊發《崔述傳》，對崔述的「以百家之言古者，多有可疑，因疑而力求其是」的治學方法頗為推賞：

淺識者流，僅知其有功于考史，不知《考信錄》一書，自標界說，條理秩然，復援引證佐，以為符驗，于一言一事，必鉤稽參互，剖析疑似，以求其真。使即其例以擴充之，則凡古今載籍，均可折衷至當，以去偽而存誠，則述書之功，在于範圍謹嚴，而不在于逞奇炫博，雖有通蔽，然較之馬氏《繹史》，固有殊矣。近人於考證之學，多斥為煩蕪，若人人著書若崔述，彼繁蕪之弊，又何自而生哉？<sup>71</sup>

劉師培為崔述撰寫的小傳，也是受到日本學界的影響，他說「崔氏既歿，其

68 胡適致顧頡剛函（1920.12.8），《胡適論學往來書信選》（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頁1012。

69 顧頡剛致胡適函（1921.1.31），《胡適論學往來書信選》，頁1025。

70 胡適致青木正兒函（1921.2.4），耿雲志《關於胡適與青木正兒的來往書信》，頁319。

71 劉師培，《崔述傳》，《國粹學報》，第34期第9號（光緒三十三年九月二十日）。



書不顯，近歲日人那珂通世，復刊其遺書，閱者始稍眾」，劉氏此論相當精粹，其識見遠在胡適之上，然時運不佳，崔述為人所知，似還局限於極少數學者之間，至胡適在日本第二次發現崔述，以及他在1923年4月《國學季刊》刊發了的科學的古史家崔述，崔述在「科學」的旗號下才聲名大振。胡適此作其實就是崔述年譜，編撰之法與《章實齋年譜》相同，原稿後由趙貞信補全嘉慶之後部分，原稿又得其補正，自此之後到1936年顧頡剛輯校的《崔東壁遺書》出版，崔述在史學中的地位已得到完全確定，正如姚紹華在《崔東壁之史學》所下的斷語：「由是言之，可知崔東壁本經書以辨證古偽史之精神，乃目為中國科學的考古史精神之所自蛻。科學和考古史，為建設中國史學之新生機，東壁在吾國史學界上，於是乎不朽矣。」<sup>72</sup>

## 五、結 語

從二十世紀初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日關係進一步惡化之前，中日的學術交流基本上保持良好的態勢。<sup>73</sup>同以往兩國之間的學術交流相比，這一期間的交流中國輸入的傾向偏重一些，譬如在各種專史的撰寫、小說研究以及敦煌俗文學等方面，造成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大致是日本在接受西學方面較中國先行一步，日本的漢學家往往能借助西方的科學方法或者知識體系來整理中國文化。上文提及的崔東壁的《考信錄》，能引起胡適和顧頡剛的注意，很重要的一個因素是那珂通世研究的暗示，其實崔氏其書其義在《書目答問》（1876年初刻本）卷1「經部」和「附二」國朝著述諸家姓名略「漢宋兼採經學家」中已提及，<sup>74</sup>只是當時缺少善於發現的眼睛並賦予《崔東壁遺書》

72 姚紹華，《崔東壁之史學》，見所撰《崔東壁先生年譜》（上海：商務印書館，1931），「附錄」，頁90-91。1928年前後，胡樸安請朱師轍（二十年代在北京、開封兩地任教任職）代購《崔東壁遺書》，朱在回覆胡的信中說：「《崔東壁遺書》邇亦購闕，市價漲至廿餘元，先生如欲購此書，當屬書肆代覓，然亦不能刻期而得」（二月十三日）。見宣華整理，《胡樸安友朋尺牘》（二），《歷史文獻》（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1），第4輯，頁173。由此亦可見崔述在當時受學界關注的情形。

73 參見桑兵著《國學與漢學》（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第6章 東亞各國的學術交流，頁201-222。

74 參見羅志田，《山海經》與近代中國史學，《中國社會科學》，3（2001.6），頁189。

在學術史上的新意義。胡適和青木正兒的交往是近代中日學術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話，從中可看出學術資料的互援以及學術研究的相互影響，同時，兩位學人的學術交流牽涉到眾多中日學術界的人和事，亦顯示出學術研究的國際性。

## A Textual Research on Academic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n Modern Times with a Focus on Hu Shih and Aoki Masaru

Yanping Xu<sup>\*</sup>

### Abstract

The process of the formation of Japanese Sinolog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hinese studies are very similar. This paper first discusses how traditional Chinese studies changed into modern Sinology and confirms the important role that the higher textual criticism of Qing dynasty and the European oriental studies played in the transition. Meanwhile it was under the similar academic background that the academic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became more probable and fruitful. Second, based on the close contact of Hu Shih 胡適 and Aoki Masaru 青木正兒, the author elaborates on the inspiration and assistance to Chinese scholars derived from the discoveries of rare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ry and opera documents in Japan and the advanced Japanese Sinologists' researches. A case in point is Hu Shih's textual criticism on *Heroes of the Marshes* 水滸傳.

The last part of the paper deals mainly with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Japanese academic exchanges. Through the bridge constructed by Hu Shih and Aoki Masaru, Japanese Sinologists' academic achievements, such as Torajiro Naito's 內藤湖南 research on Zhang Xuecheng 章學誠 and

---

\* Yanping Xu is a lecturer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t Nanjing University.

Michiyo Naka's 那珂通世 research on Cui Shu 崔述, pushed forward the systematization of the National Past advocated by Hu Shih. In the mean time, Aoki Masaru, as a professional intermediate agent, introduced the information about the systematization of the National Past into Japan through the journal *Shinagaku* 支那學, while his study was once influenced by Hu Shih. Focused on the contact of two scholars, the author tries to explain that the academic exchanges and the share of academic resources gave an impetus to the Chinese studies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Keywords:** history of Chinese studies, modern China, Hu Shih 胡適, Aoki Masaru 青木正兒, systematization of the National Past